

泰戈爾與中國

(本文插圖第140頁)

●徐天淦(大陸作家)

文盲夫人賢妻良母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從一九一三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以來，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讚許。

當時，有的國家給他以國賓的待遇，有的提燈遊行，向他表示致敬，有的隆重集會，聆聽他的演說，有的國家還成立了泰戈爾學會，出現了波及世界文壇的「泰戈爾熱」。他的作品被譯成了多種文字。瑞典著名作家海登斯泰姆在為泰戈爾爭取諾貝爾文學獎時，在瑞典皇家學會的會上說：「我不記得，過去二十餘年裏我曾讀過如此優美的抒情詩歌，從中我真不知道得到多少雋永的享受……現在我們終於找到了具有真正偉大水平的一個理想詩人。」但是，你是否知道他的妻子是個文盲。

泰戈爾二十二歲時與小他十一歲的姑娘帕茲達列妮結婚。這不是一個愛情的婚姻，而是由父母之命按照傳統習俗而結合的。

姑娘長得不大漂亮，只讀了一年的孟加拉語，幾乎是個文盲。泰戈爾默許了這門親事，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儘管他在文學創作中，是那樣的生氣勃勃和充滿着浪漫的激情，但在父親面前却是個俯首貼耳、唯命是從的孝子。他把父親的每一句話都當作法則加以維持，認為父親是永遠不會錯的。

帕茲達列妮是個很普通的，缺乏文化修養的媳婦，但却是位賢妻良母。整整二十五年，她以無限虔誠的感情照顧泰戈爾的生活，為他生了五個孩子。雖然她很年輕，又生活在一個高貴和有文化修養的環境裏，而她的衣飾却十分簡樸，從沒有戴過任何貴重的首飾。她高興地把丈夫的純潔理想看作自己的理想。她雖文化程度很低，但在丈夫的嚴格要求下，她不僅掌握了孟加拉語，同時還學會了英語和梵語。此外，她還用孟加拉語改寫了梵語的簡易讀本《羅摩衍那》，曾經在舞台上演出過丈夫的戲劇《國王和王后》。

不幸的是，帕茲達列妮過早離開了人世。在她患病期間，泰戈爾整整兩個月，日夜守護着她。他拒絕僱用職業看護。當時還沒有電風扇，他一直坐在自己年輕妻子的床邊，輕輕地搖着扇子。

傷逝詩篇纏綿悱惻

不幸的是，帕茲達列妮過早離開了人世。在她患病期間，泰戈爾整整兩個月，日夜守護着她。他拒絕僱用職業看護。當時還沒有電風扇，他一直坐在自己年輕妻子的床邊，輕輕地搖着扇子。

在她死後，泰戈爾通宵達旦地在陽台上踱來踱去，嚴禁家人去打擾他。

儘管泰戈爾以堅毅不拔的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痛苦並不因此而減少。在妻子活着的時候，他沒有對她的愛作出充分的估價並給予償還，從而更加重了他的痛苦。這種負疚的悲痛之情在他的詩集《追憶》都有所反映。例如：

今天光明在寧靜的床榻上，
變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
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邊，
長夜逝去，晨曦落臨。

再如：

她活在人間，
不斷給予我一切。
我如今將償還她的禮物，
在那兒擺放這個奉獻。

歌曲征服印度人民

泰戈爾一生創作了大量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在他的五十卷全集中，收集了一千多首詩，十

二部長篇小說、一百多篇短篇小說、三十部劇本和二千首歌曲。在現代作家中，他具有別人所沒有的獨一無二的特點：即一方面他的詩和散文為精通文學的孟加拉專家所喜歡，撰寫有關他作品的論著不斷出現；另一方面，他所創作的歌曲，常為人口密集的大街小巷和偏僻鄉村的感情純樸的人們所吟唱。

有這樣一件事，政治家艾德維勒·孟德格（後來曾擔任印度國務秘書）一天晚上騎馬經過一座森林時，看見一處曠野，有一些人圍着篝火坐着。他縱身跳下馬，加入他們的行列，傾聽他們的歌唱。不一會兒，一個瘦弱的孩子從密林中鑽出，也參加進來。後來輪到這個孩子唱歌時，他唱了一首「歌詞和音樂比其他歌曲都要優美」的歌。當人家問他這是誰的歌時，他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這首歌到處都在唱。」後來，孟德格「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區域」又聽到了那首歌。當他問到歌曲的作者時，他第一次聽人說作者的名字是泰戈爾。

而泰戈爾自己也說過：「我確已用歌曲征服我國人民了。現在連趕牛車的人，也在唱我的歌了。」

鄙夷爵位抗議屠殺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英國內閣的印度事務大臣蒙迪基在印度作實地調查。面對印度人民為爭取自由、獨立而日益高漲的鬥爭，他在回國後就向內閣建議，讓印度人民參加本國政府管理。而英國政府不僅沒有採納，更乘歐洲大戰獲勝之機

，拋出了臭名昭著的「國防條令」以回答印度的挑戰。

最為突出的是阿姆利扎的吉利揚瓦拉公園的屠殺事件。軍隊根據達耶將軍的命令，向手無寸鐵的集會羣衆開槍射擊，連打了六百多發子彈，人們無處逃生，活活被打死慘不忍睹。根據政府估計，約有三百七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人負傷，而且對受傷者也沒作任何醫療安排。這是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的事，但當局嚴禁新聞報導，竭力掩蓋事件真相，以至人們在這一悲慘事件發生幾周之後，還沒有獲悉任何有關的消息。

當消息透露出來，傳到泰戈爾的耳畔時，他十分不安，馬上停止桑地尼克坦的一切工作，趕到加爾各答，計劃邀請政界領袖舉行公衆集會，並準備親自擔任大會的主席。與此同時，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兒子，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深夜，寫信給印度總督切姆斯福德勳爵，聲明放棄自己的「爵位」，以示抗議。這封信于七月二日刊登在《印度快報》上：

「我至少能為自己國家做這件事，給由于恐懼而遭受不幸，變得無言和麻木的千千萬萬同胞以抗議的聲音。我將把它的整個後果放在自己頭上。現在，這個時刻來到了。在這侮辱的和不諧事件裏，這個榮譽的獎賞更烘托出我的恥辱。至少我想忘掉自己的全部特權，卸下自己的全部裝飾，與自己的同胞站在一起。」

印度民衆歡迎自己詩人的這一英勇舉動，但英國政府及公衆對一個英國國民竟然「傲慢」地拒絕「英國陛下」所隆重授予的榮譽一事，感到

極為憤慨。這個行動確實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在內政部的一件秘件中這樣寫道：「基于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放棄英王陛下為表彰其文學造詣所授予的榮譽是沒有先例的。」印度總督意識到自己不能解除前任總督代表英王授予泰戈爾的封號，所以泰戈爾仍是一個正式的爵士。而泰戈爾自己却不再使用這個封號，視之為糞土了。

觀賞梅蘭芳的洛神

一九二四年五月，爲了中印友好和恢復兩國之間中斷三千年的古老文化傳統，泰戈爾獲得了中國的大學演講協會會長梁啟超的邀請，不辭辛勞地來華訪問講學。

七日泰戈爾一行到達北京，這一天正巧是他六十三歲生日。十日，新月社在協和醫學院禮堂，用英文演出了他的話劇《齊德拉》以慶祝壽辰。由張彭春導演，梁思成繪景。担任女主角的是後來成爲著名建築家的林徽因教授，男主角是劉歆海。另外徐志摩飾愛神，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飾四季之神陽春，丁西林、蔣介震等飾村民，王景瑜和袁昌英飾村女。泰戈爾在梅蘭芳的陪同下觀看這場演出。劇終，泰戈爾對梅蘭芳說：「在中國看到了自己的戲很高興，可是我希望在離京前還能看到你的表演。」

十九日，梅蘭芳在開明戲院爲泰戈爾專演了一場《洛神》。泰戈爾身穿紅色長袍蒞臨，自始至終聚精會神觀看，隨後又到後台道謝說：「我看了這齣戲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見面再談。」次日中午，梁啟超、姚芷父和梅蘭芳等爲泰

戈爾饒行。席間，泰戈爾贊揚了梅蘭芳的表演，然後很坦率地對《川上之會》一場的佈景提出了意見。他說：「這個美麗的神話劇，應該從各方面來體現偉大詩人的想像力，而現在所用的布景未免顯得平淡。」他建議：「色彩宜用紅、綠、黃、黑、紫等重色，創作出人間不經見的奇峯、怪石、瑤草、琪花，並勾勒金銀線框來烘托神話氣氛。」（後來，梅蘭芳根據這一意見重新設計了那一幕布景，果然取得應有的效果，此後就一直沿用下來。）

泰戈爾那天還即興賦詩一首，用毛筆寫在一柄紙扇上，贈給梅蘭芳以作紀念。原詩是孟加拉文，他又親自譯成英文，一并寫下。寫罷，還與致勃勃地朗誦給大家聽。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

語言的面紗

遮蓋着你的面顏；

正像那遙遠如同一脉

縹渺的雲霞

被水霧籠罩着的峯巒。

據專家對這首詩解釋說：「詩人非常形象地用雲霧中的峯巒起伏，來描述他所熱愛而又有語言隔閡的國家的藝術家那種紗袂飄揚、神光離合的印象，他感到美的享受。」

泰戈爾回國之前，曾希望梅蘭芳能率領劇團訪問印度，使印度人民有機會觀賞他的藝術。遺憾的是，這一促進兩國人民友好的願望，由于多種原因始終未能實現。

與徐志摩結忘年交

這裏還需要提一下，泰戈爾在中國逗留期間，一直是由徐志摩陪着他的。泰戈爾的隨行人員埃爾赫斯特回憶道：「徐志摩是一位風度翩翩、幽默和富于想像力的年輕中國詩人……在從上海坐船到南京的途中，一個明亮的月夜，他們倆並肩而坐，暢談他們年輕時在英國欣賞的那些詩人的作品以及世界文壇的情況……作為一個富于想像力的譯員和陪同人員，他和泰戈爾建立了友誼。這友誼一直延續到他那年輕的生命不幸夭折時為止。」

泰戈爾曾給徐志摩取一個印度名字「蘇西瑪」，並把《在中國的講演》一本獻給他。他在上面題詞道：「獻給我的朋友蘇西瑪（徐志摩），由於他的周到照料，使我得以結識偉大的中國人民。」

邀徐悲鴻赴印講學

一九四〇年春，徐悲鴻應泰戈爾之邀，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兩人在國際大學所在地桑地尼克坦度過了許多美妙的時光。

二月十七日，聖雄甘地和他的妻子卡斯杜爾帕來桑地尼克坦拜訪泰戈爾（他們是老朋友了）。泰戈爾親自將徐悲鴻介紹給甘地，並建議舉辦徐悲鴻的畫展，以促進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甘地表示贊許。

不久，畫展先後在桑地尼坦和加爾各答舉行。泰戈爾親自為畫展寫了序。他寫道：「美的語

言是人類共同的語言，而其音調畢竟是多種多樣的。中國藝術大師徐悲鴻在有韻律的線條和色彩中，為我們提供一個在記憶中已消失的遠古景象，而無損於他自己經驗裏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

我歡迎這次徐悲鴻繪畫展覽，我盡情地欣賞了這些繪畫，我確信我們的藝術愛好者將從這些繪畫中得到豐富的靈感。既然旨趣高奧的形象應由其本身來印證，多言是饒舌的，這樣，我就升起談話的幃幕，來引導觀眾走向一席難逢的盛宴。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徐悲鴻結束了在印度的講學和訪問。他回到桑地尼克坦，向泰戈爾辭行。當時，泰戈爾正值病體稍愈，披著那有波紋的長髮和美麗的銀鬚，躺臥在長椅上。

「徐悲鴻先生，」泰戈爾聽說徐悲鴻離開印度，吃力地欠起身子說：「我希望你行前，能為我選畫。」

泰戈爾六十多歲才開始作畫，到八十歲時，已作畫兩千餘幅。他所用的作畫工具有中國和日本墨，西洋畫的水影、水粉、鉛筆、粉筆、油色、題材也多種多樣。他的繪畫曾在法國、英國、蘇聯、美國舉行展覽，深受好評。

於是，徐悲鴻就與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南達拉爾·鮑斯先生用了整整兩天時間，將泰戈爾的兩千餘幅作品一一檢視，選出精品三百餘幅，最精者七十餘幅，交國際大學出版。

泰戈爾對此十分滿意，那深澈的眼睛裏泛起

了溫和的微笑，消瘦的臉上浮現出不忍猝離的憂傷。

國際大學中國學院

泰戈爾所創辦的國際大學，座落在離加爾各答九十英里的波爾普區域的桑地尼克坦。這是從類似印度古代森林學校的形式而發展為一個具有完整規模的學院。學院始終貫徹泰戈爾的政治主張和教育主張：沒有宗教的偏見，沒有種族的岐視，沒有民族的隔閡，師生在融洽的氣氛中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生活。這一股從桑地尼克坦校園中沖發出來的暖流，融解着印度全國範圍內宗教和種族間長期存在的雪山和冰川，因而使一些實行「分而治之」政策的異國統治者感到恐懼。

正像泰戈爾的詩已經傳頌於全世界一樣，他的這所學校也很快為人所知曉了。許多著名人士紛紛發來信函，表示祝賀。這種熱烈的鼓勵，使泰戈爾決心把桑地尼克坦學校擴展成爲一所國際性質的大學。他從親身的體驗中認識到，各國人民都要相互學習，相互了解，從而消除岐視，抑制戰亂，要從溝通文化中促進東西方人民的團結和友愛。

擴建任務雖然十分艱巨，但却得到羅曼·羅蘭、蕭伯納、羅素、愛因斯坦等人的大力贊助。歐美各國政府和人民協助改建校舍，捐贈了大批圖書和儀器，充實設備，還派來教授和學生。這樣，在一九二一年，桑地尼克坦學校就改稱爲「國際大學」。

泰戈爾在一九二四年來華訪問期間，把他的這種願望和規劃及時地告訴了中國的人民。在上海等地的演講中，他說道：「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見過我在國內所辦的那個學院，即國際大學。我已不自量力地使這個大學負起一個國際性的使命，就是要求各國學生到這裏來互相學習各國歷史文化，溝通各國人民感情。這個使命沒有中國人士的幫助和合作，是絕不能完成的。」

蔡元培對泰戈爾的這一願望極爲贊同。在他的影響下，其他著名人士紛紛響應在印度國際大學設立中國學院，以便兩國學子相互研究學術文化。後來，譚平山就把蔡元培簽名的一封信交給泰戈爾，泰戈爾感到非常高興。

不久，受蔡元培囑託，譚平山籌組「中印學會」。蔡元培被選爲會長。這之後，譚平山攜着泰戈爾和蔡元培的親筆信件，十餘次來往於中印之間。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二月蔡元培給泰戈爾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先生：

由於健康關係，我很久不在上海，直到今年年初，譚平山教授轉來您九月二十八日惠函時，我才見到他。歷史上，印度曾一度對中國文化產生無可比擬的影響。儘管近幾個世紀來，我們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有所減少，可是對於我們每個珍視自己祖國文化傳統的人來說，沒有什麼能比恢復這種傳統的友好聯系，以便我們學習貴國的使古代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的方

法和經驗而更受到我們歡迎的了。

我們感謝您慷慨地允諾「中印學會」把桑地尼克坦的國際大學作爲它的總部。

關於譚教授籌款建立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大廈一事，我當盡力和他合作，儘管我們目前財政困難，譚教授仍然在竭力籌措。

請允許我向您致以良好的祝願和親切的問候。

蔡元培 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國立中央研究院
在雙方的共同奮鬥和努力下，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終於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舉行成立典禮。聖雄甘地和尼赫魯都給泰戈爾發來賀電。譚平山教授被任命爲院長。隨後開始選派學生赴印度學習。這名學生就叫魏風江，現住在杭州，今年已八十歲了。據報導，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在西子湖畔舉行的一個儀式上，印度駐華大使沙爾曼·海達把一尊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的半身塑像贈送給魏風江，因爲他是泰戈爾生前唯一的中國留學生。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即可收到書刊。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
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
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